

推动我国与RCEP中间品贸易高质量发展

□ 胡 雷 匡贤明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拓展境外经贸合作区功能,发展中间品贸易,开拓多文化市场。”

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兴起,严重冲击和扰乱了全球与区域的产业链供应链网络。作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促进亚洲经济一体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代表产业链联系的中间品贸易是RCEP区域贸易的主体。面对域外干扰,共同应对美国“对等关税”挑战,我国与RCEP其他成员国需要积极推动中间品贸易的高质量发展,释放区域中间品贸易潜力,做好中间品贸易高质量发展这篇大文章。这不仅有助于推进RCEP进程,进一步提升区域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和经济增长,也有助于推动我国实现贸易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国与RCEP中间品贸易具有良好基础,蕴藏较大潜力

我国与RCEP中间品贸易已形成良好的规模和产业基础。第一,从规模和增速看,根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数据计算,2014—2023年10年里,RCEP区域中间品贸易规模从26024.54亿美元增长至36076.93亿美元,涨幅达到38.63%。其中,我国对RCEP区域中间品贸易规模从7850.52亿美元增长至11766.75亿美元,涨幅达到49.88%,显著高于区域的平均涨幅。RCEP成员对区域内贸易以中间品贸易为主,达到50%以上。其中,我国对RCEP中间品贸易占对外贸易总额比重超过65%。第二,从我国对RCEP区域的中间品贸易依存度来看,我国对RCEP中间品贸易占对世界的中间品贸易比重超过30%。第三,我国与RCEP中间品贸易已形成雄厚的产业基础,保持了在区域中间品贸易的主导地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30%,连续14年位居全球首位;在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四成以上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根据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度报告《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2024》,我国保持了在亚洲中间品

贸易中的主导地位。2022年,在交易量最大的22种零部件产品中,我国有20种处于领先地位,其中电信设备的零部件,电子元件如二极管、晶体管、集成电路,钢铁材料,纱线和纺织品,汽车的零件及附件等交易量位列前五。

我国与RCEP中间品贸易仍具有巨大潜力。从规模上看,欧美和日韩在贸易高速发展阶段,中间品贸易在进口中的占比达40%~50%,在出口中的占比则达到65%~75%。2024年,我国对RCEP中间品进口占进口贸易的比重约为80.5%,对RCEP中间品出口占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约为57.6%,提升我国对RCEP中间品出口份额仍有较大空间。从结构上看,根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数据计算,2023年,我国对RCEP区域初级产品、半成品、零部件三大类中间品占中间品贸易总额的比重分别为17.4%、66.1%、16.6%,我国与RCEP中间品贸易仍以半成品为主;且2000—2023年初级产品和半成品占比呈上升趋势,零部件占比呈下降趋势。这说明,在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零部件领域,我国与RCEP中间品贸易仍有广阔的拓展空间。

推动我国与RCEP中间品贸易高质量发展仍面临挑战。第一,支撑中间品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产业结构匹配度不高。当前,我国制造业总体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水平,从制造大国变为制造强国仍然需要不懈努力。同时,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偏低,生产性服务业亟需加快发展,并需要进一步提高与制造业的融合效率。第二,RCEP规则利用率不高。RCEP中间品贸易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仍面临着关税壁垒与各类非关税壁垒,投资壁垒的掣肘。第三,美国“对等关税”行为直接冲击RCEP区域中间品贸易。以消除贸易逆差为直接目的的美国“对等关税”政策,使RCEP区域现有的供应链网络面临严重冲击,不确定性加大。

以产业结构升级推进与RCEP的中间品贸易发展,形成产业升级与中间品贸易良性互动

推动制造业升级,助力RCEP中间品贸易发展,推动我国进一步向区域价值链上游攀升。一方面,系统梳理RCEP中间品贸易的具体产业和具体方向,不断增强我国对相关产品的制造能力,进一步向区

域价值链上游攀升。例如,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重点关注电气设备零部件、机械设备转型升级的动力。从我国科技结构与产业结构角度看,实现大部分关键进口高技术含量中间品的国产替代还需要一定时期。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充分利用RCEP区域自由贸易的助力作用。一方面,依托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扩大高技术含量中间品的进口,不断释放进口中间品的知识和技术溢出效益;另一方面,通过扩大高技术中间品出口,不断释出口中间品的学习效应和竞争效应,由此通过中间品的进口与出口促进国内制造企业提升自身创新能力,从而推进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把握数字化绿色化开放机遇与区域蓝色产业发展潜力,显著拓展我国与RCEP中间品贸易新空间。数字化与绿色化发展是全球贸易经济发展趋势。我国作为RCEP中间品贸易网络核心,需要密切关注RCEP数字产业、绿色产业、蓝色产业等产业发展的最新市场需求,加大对相关中间品的技术研发,并将其转化成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出口优势。第一,在数字产业领域,打造各类数字化贸易平台,争取将更多的中间品贸易链条延伸到RCEP区域,同时,通过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帮助RCEP成员搭建数字产业发展的制造基础。第二,在绿色产业领域,我国在以电动载人汽车产业链为典型代表的领域具备发展优势,RCEP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制造业企业仍需从国内进口大量零部件。第三,在蓝色产业领域,可先以东盟成员为重点,充分利用东盟蓝色经济资源禀赋,推进中国—东盟海洋基础设施一体化、海洋旅游经济一体化、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一体化,加大包括海洋牧场、海工装备等与蓝色经济有关中间品的制造和贸易。

以单边开放等特别之举助力与RCEP的中间品贸易,共享发展红利

落实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政策。比如,率先全面履行RCEP承

诺,进一步降低我国对RCEP成员中间品关税,促进深化分工。当前,RCEP大部分成员对区域内中间品贸易加权平均关税已接近零,但柬埔寨、中国、马来西亚、韩国等成员对RCEP区域内的中间品加权平均关税处于4%~5%左右的区间内。我国作为RCEP区域中间品贸易的核心,有条件率先落实RCEP承诺,加快推进对RCEP区域半成品、零部件等中间品的全面零关税,并主动缩短过渡期。再比如,率先着力降低非关税壁垒。由于非关税壁垒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对阻碍贸易便利化的影响力,从RCEP以中间品贸易为主的特点出发,需要着力降低非关税壁垒对中间品贸易的影响,并努力实现重大突破。根据全球贸易预警数据库,我国对RCEP实施的非关税措施与自RCEP承受的非关税措施数量较多。发挥中国的积极引领作用,率先主动降低非关税壁垒,并吸引各成员加快消除非关税壁垒,显著减少区域内中间品非关税壁垒数量。

进一步提升我国投资便利化水平,以投资增长促进中间品贸易发展。中间品贸易发展本质上是产业链的国际延伸,产业链越长,中间品贸易越发达。跨境直接投资的增长对延伸产业链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从而能够推动中间品贸易发展。为此,一方面,我国要重点在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市场发展、科技与创新环境、劳动力市场、制度与营商环境等要素型开放方面进一步提升水平,吸引RCEP跨国企业来华投资,带动优质中间品进口规模扩张。另一方面,要以多元化拓展我国中间品出口市场为导向,鼓励国内企业优先在RCEP区域投资布局,在带动当地产业发展的同时,促进我国中间品出口贸易发展。

发挥开放新高地的作用,加快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积极推动RCEP协定规则升级,促进区域中间品贸易发展。例如,在海南自贸港内率先推进RCEP原产地规则升级,降低区域价值成分计算法下的增加值累积比重,实现由部分累积向完全累积的升级;加快实现海南与RCEP“零关税”配套政策叠加,争取扩大零关税中间品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商务服务、法律服务、金融服务开放,通过高质量的生产性服务贸易助力中间品贸易发展,把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为制度型开放新高地。

【作者单位:胡雷,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匡贤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 王晓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只有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党员发挥应有作用,党的根基才能牢固,党才能有战斗力。”基层党建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党执政兴国的力量源泉和根本所在。新时代加强基层党建的关键在于解决实践中普遍存在的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两张皮”的现象,集中表现为“体用不达”与“体用不通”。“体用不达”指理论学习的深度不足,灵魂触及不强,党员思想内化、行动自觉不力;“体用不通”则指外化不足,学习成果向解决实际问题、服务群众、推动发展转化的路径不畅、效果不佳。这一“体用困境”削弱了党建工作的实际效能。红色研学,作为一种融合历史资源、情境体验与实践反思的教育形式,以其强大的情感激发力、历史穿透力和实践启发性,为破解这一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动能。

体用困境:基层党建学用脱节的核心表征

“体”之虚浮,认知浅表化与情感疏离化的表征。基层党组织理论学习停留于文本宣读、概念浅析、知识浅尝,缺乏深度学习与脉络的深度把握,析理达意不明、一知半解常有,致使党的创新理论、优良传统的情感认同和价值共鸣乏力,无法真正入脑入心。

“用”之乏力,实践转化断层与能力短板的体现。理论学习与基层治理、服务群众、化解矛盾、推动发展断裂是影响基层党建的关键,党员缺乏将理论原则、历史经验有效转化为工作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支撑,导致想用不会用、能用不好用的困境。

“体”“用”割裂,有效衔接机制缺失的重要表现。基层党建传统模式中,知与行隔离是常态,其关键在于缺乏有效贯通认知深化与实践深化的桥梁和转化器,致使学习成果难以自然、顺畅地流向实践环节。

红色研学:赋能“体”“用”贯通的核心优势

情境浸润,深化“体”之认同。置身革命旧址、烈士陵园触摸历史遗存,聆听生动故事,使抽象的理论和遥远的历史变得可感、可知、可亲,强烈的代入感有效激发党员情感共鸣,深化对党的奋斗历程、初心使命、精神谱系的价值认同,解决“体用不达”的情感内化难题。

具身体验,催化“用”之自觉。通过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实践活动,使党员在亲身实践中感悟革命先辈的智慧、勇气与群众工作方法。这种“做中学”的模式,促使党员主动思考“当时为什么能成功”“今天如何借鉴”,将历史经验与当下工作场景建立联结,激发“学以致用”的内在驱动力,为“体用不通”提供转化动力。

问题导向,启迪实践智慧。围绕基层现实难题设计问题,引导党员从党的历史和现实工作中提炼智慧、寻找方法,在直接服务群众中求解问题,实现历史智慧向实践能力的有效迁移。

多元互动,激活主体动能。研学中研讨交流、团队协作、任务共创等打破了单向灌输模式,党员在互动中深化理解、思想碰撞、分享经验,激发主体意识和参与热情,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建构、积极应用,为“体”“用”贯通提供组织活力保障。

机制构建:红色研学深度赋能基层党建的实践路径

“情境—反思”深度内化机制。依托党建主题精研情境设计,精选资源点位,设计深度沉浸环节,突破时空限制,增强代入感;强化结构化反思,在情境体验后,设置核心引导问题,通过撰写心得、分组研讨、导师点评等方式,引导党员将感性体验升华为理性认知,将历史经验与个人思想、岗位职责、现实挑战深度链接,实现理论认知的深度内化。

“问题—求解”实践转化机制。建立课题认领机制,将基层面临的突出难点、痛点问题梳理形成实践课题,实现定向研学与智慧萃取,引导党员聚焦课题,从历史情境中提炼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基于历史智慧启示,结合现实条件,团队协作制定解决方案,推动方案在社区、网格或项目中试点应用,建立跟踪评估反馈机制,形成“带着问题学→汲取历史智慧→形成解决方案→实践检验反馈→优化提升”的完整闭环,打通“用”之梗阻。

“参与—共创”组织激活机制。实施任务驱动式研学,设定明确产出目标,如策划红色微展览、服务群众志愿行等,使党员在研学中分工协作,共同为达成目标而努力;搭建成果共创与评议平台,成果面向公众展示,接受群众评议,激发集体荣誉感、责任感,汇集众智优化方案;设立红色实践岗,将研学中激发出的热情和形成的共识,转化为常态化行动。

“数字—实景”融合赋能机制。建设线上红色资源库,整合本地红色资源,研究成果,打造数字化学习平台,提供便捷、系统的理论学习入口,延伸学习链条;深化技术融合应用,增强历史场景还原度和互动体验感;开发线上虚拟展馆、互动答题、情景模拟小程序,满足碎片化学习需求;建立研学社群,促进线上线下互动,鼓励线上心得分享、案例讨论、难题会诊。

红色研学赋能基层党建,核心价值在于通过情感共鸣熔铸信仰之“体”,以历史智慧启迪实践之“用”,以深度参与激活组织之“能”,构建起一套破解“体用不达、体用不通”的系统化新机制。将红色研学深度融入基层党建的肌体血脉,锻造锤炼党员党性、提升履职能力、密切党群关系、破解治理难题的常态化利器,方能锻造出一支既深谙“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历史逻辑与思想精髓,又具备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现实本领的过硬党员队伍。唯有实现“体”的深度内化与“用”的高效转化的有机统一,让红色基因在“知行合一”的实践中焕发磅礴伟力,才能确保鲜红的党旗在基层飘扬,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

（作者系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琼属华侨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深化体制改革 为党建效能提升构筑制度保障和动力引擎

□ 刘建华

基层党建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最后一公里”落地生根的关键环节。面对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单纯依靠传统的组织建设或单向度的体制改革已难以有效应对复杂挑战。基层党建的实践创新为党组织体制改革提供了源头活水和检验标尺,而体制改革的深化则为党建效能提升构筑制度保障和动力引擎,二者相互依存、双向赋能的协同关系日益凸显。系统研究二者协同推进的策略,不仅是破解当前基层治理深层次矛盾、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更是激活组织活力、释放治理效能、巩固执政根基的立论之基与实践之钥。

优化制度设计,构建双向赋能责任落实与考核机制

要确保基层党建与党组织体制改革实现双向赋能,必须建立权责明晰、激励相容的制度体系,通过科学考核机制将协同要求转化为刚性约束,打破党建与改革“两张皮”现象,以制度刚性确保二者在目标设定、过程管理和结果评价上的深度融合。

首先,需建立“双清单”责任捆绑机制。将党建任务与体制改革指标合并形成《双向赋能责任清单》,明确党组织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需同步推进“三会一课”质量提升与“街道管理体制改

聚焦实践创新,推动党建引领与改革任务深度融合

实现双向赋能不能仅停留在制度层面,更需要通过具体实践将党建的政治优势转化为破解改革难题的实际能力,这就要求找到二者在基层场域中的操作结合点。实践表明,凡是党建与改革深度融合的领域,往往能产生“1+1>2”的治理增值效应。

推动党建引领与改革任务深度融合,关键在于将组织优势全方位渗透到改革各环节。这一融合过程需要经历从组织嵌入到机制创新,再到效能转化的递进发展。在基础层面,要着力推进

组织体系建设。一是建立“双向进入”机制,推动党组织班子成员与改革专班负责人交叉任职,确保党组织在改革决策中的话语权。二是创新组织设置方式,按照改革任务模块同步建立功能型党组织,实现组织架构与改革需求精准匹配。三是完善协同运行制度,建立党建与改革联席会议机制,将党建工作要求嵌入改革全流程。在深化层面要重点创新工作载体形式。一方面,打造“改革攻坚”专题组织生活,将行政审批、流程再造等改革难点纳入“三会一课”必议内容。另一方面,建立“党员领办”机制,组织党员干部认领改革任务,通过项目化运作推动问题解决。在提升层面,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制定包含过程督导、成效评估、结果运用的全链条管理规范,将党建促改革成效纳入绩效考核体系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参考。同时建立经验推广机制,对成熟做法及时总结提炼,形成可复制的制度成果。

强化队伍建设,培育适应双向赋能需求的复合型人才

双向赋能的最终落脚点是人的能力提升,需要重点构建“三维”培养体系,培育适应双向赋能需求的复合型人才,打造出一支既精通党建业务又熟悉改革规律的干部队伍,通过人才素质升级破解“懂党建的不懂改革、抓改革的不抓党建”的能力割裂问题。

在选拔维度上,建立“双经历”任职标准,明确街道党工委委员候选人需兼具党建部门与改革专班工作经